

为什么我们还要读《三字经》

《三字经》是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甚至可以说,是我们自以为熟悉其实非常陌生的一本书

传统的《三字经》总字数千余字,三字一句,句子也无非三百来句。但是,恐怕绝大多数人都只知道前两句“人之初,性本善”;知道紧接下来的两句“性相近,习相远”的人数,也许马上就要打个大大的折扣了;可以随口涌出接下来的“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的人,大概就寥寥无几了。也就难怪,在近期出版的一本列为“新世纪高等学校教材”的教育史专著里,竟然连引用《三字经》都引用错了。这只有用自以为烂熟于胸后的掉以轻心来解释。

说“熟悉”,在今天无非只是一种自我感觉而已,在过去则是不争的事实。《三字经》是儒家思想占据主流地位的传统中国社会众多的儿童蒙学读物里最著名、最典型的一种,且居于简称为“三百千”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之首。宋朝之后的读书人基本上由此启蒙,从而踏上了或得意、或失意的科举之路。读书人对于它,当然是萦怀难忘的。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就连传统中那些通常识字无几,甚或目不识丁的底层百姓,起码也对“三字经”这个名称耳熟能详,时常拈出几句,挂在嘴边。

说“陌生”,情况就比较复杂了。就算在传统中国,《三字经》被广泛采用,到了家喻户晓、影响深远的程度。但是,倘若就据此认为,传统的中国人就都对《三字经》有通透而彻底的了解,那也未必。

首先,正是由于身为童蒙读物,《三字经》才赢得了如此普遍的知晓度。然而,却也正因为身为童蒙读物,《三字经》也从来没有抖落满身的“难登大雅之堂”“低级小儿科”的尘埃。中国传统对儿童启蒙教育的高度重视和对童蒙读物的淡漠遗忘,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确实,清朝也有过那么一些学者探究过秦汉时期的童蒙读物,比如《史籀篇》、《仓颉篇》、《凡将篇》等,但是,他们的目的乃是满足由字通经的朴学或清学的需要。至早出现于宋朝的《三字经》自然难入他们的法眼,绝不在受其关注之列。久而久之,即使在中国教育史上,也就难以在《三字经》找到适当的位置了。在一般的教育史类著作里,我们很难找到《三字经》的踪迹,起码看不到和它的普及度相匹配的厚重篇幅。陈青之先生的皇皇巨著《中国教育史》被誉为“资料翔实,自成系统,被列为大学丛书教本,有较大影响”,是“内容更详尽,体系更宏大,理论色彩更浓厚的中国教育通史著作”。这些评价,都是陈书当之无愧的。然而,遗憾的是,在其中依然难觅《三字经》的身影。这是很能够说明问题的。

如此普及的《三字经》居然连作者是谁都成了问题,这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

其次,如此普及的《三字经》居然连作者是谁都成了问题,这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

传统中国的版权和知识



资料图片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春节假期里,有一种品尝叫《三字经》。

总长43集的《钱文忠解读(三字经)》,自农历正月初二在央视《百家讲坛》推出之后,引起许多人的关注与热议。

《解放周末》特请主讲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钱文忠撰写此文,现予发表,以飨读者。

我很愿意借《解放周末》就录制节目及编撰相关图书过程中的一些感想,向大家作一个简单的汇报,也借此机会向大家请教。

产权概念本来就相当淡漠。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三字经》的作者也许还因为它只不过是一本儿童启蒙读物,而不在意,甚或不屑于将之列入自己名下,也未可知。后来的学者,即便是以考订辨疑为时尚的清朝学者,大致因为类似的缘故,也没有照例将《三字经》及其作者过一遍严密的考据筛子。关于《三字经》的作者问题,当代最重要的注解者之一顾静(即金良年)先生在上海古籍出版社本的《三字经》的“前言”里,作了非常稳妥的交待。《三字经》甫问世,其作者已经无法确指了。明朝中后期,就有人明确地说“世所传《三字经》”,是“不知谁氏所作”的。于是,王应麟、粤中逸老、区适子都曾经被“请来”顶过《三字经》作者之名。可惜的是,此类说法都不明所本。到了民国后期,或许是因为“科学”之风弥漫了史学界,就有“高手”出来,将《三字经》的成书看成是一个过程。说到底,无非是将可能的作者来个“一勾烺”:由王应麟撰,经区适子改订,并由明朝黎贞续成,如此而已。现在,还有很多人倾向于认为《三字经》的作者是宋朝大学者王应麟。当代另一位《三字经》的功臣刘宏毅博士在他的《〈三字经〉讲记》里就是持与此相近的态度。不过,我以为是,可能还是以顾静先生概括的意见更为稳妥:“世传”“相传”王应麟所撰。

第三,古人蒙学特别看重背诵的功夫,所谓“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蒙学者基本不负讲解的责任。《三字经》等童蒙读物主要的功能就是供蒙童记诵。更何况,古时的蒙学者,绝大多数所学有限,不能保证能够注意到《三字经》本文中的一些问题,更未必能够提供清晰有效的解说。偶或也会有博学之士为孩童讲解,但是,又绝无当时的讲稿流传至今。因此,面对童蒙读物《三字经》,我们并没有完全理解的把握。这方面的自信,

倘若有的话,那也终究是非常可疑的。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四句,表面上看,没有任何难解的地方,甚至根本不需要任何解释。可是,真的是这样吗?

我在这里,就拿《三字经》的前四句做个例子。许多人都可以朗朗上口,表面上看,没有任何难解的地方,甚至根本不需要任何解释。可是,真的是这样吗?

既然“性本善”,怎么紧接着就会说“性相近”呢?难道不应该是“性相同”吗?这里岂不是明显存在着逻辑问题吗?更何况,“人之初,性本善”又究竟是哪一位儒家大师讲的话呢?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来解释和理解呢?

我们一定要注意,儒家对于人性是善是恶的看法并不是统一的。儒家关于人性的理论主要有三派:性善、性恶、性有善有恶。

比如孔子,他是持人性有善有恶的看法的,并没有下过断言。荀子则是认同性恶的。而孟子却是倾向于“性善”的。

孟子性善说的根据是什么呢?《孟子·公孙丑上》讲:“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人之所以为人而不是禽兽,就是因为有这“四心”。然而,凭什么说,人人都有这“四心”呢?《孟子·告子上》讲:“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所同然乎?”《孟子·公孙丑上》里还举了一个例子:“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侧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认为,这样善良的心理情感就是人性善的基础。

我们认真地思考一下,就会发现,孟子的逻辑是有欠严密的:其实,没有办法证明人都像孟子所希望的那样有“四心”;也不能保证人之于“味”、“声”、“色”皆有同样的感觉。无论多么不愿意,我们都不能不说,性善论的论证基础是很薄弱的。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三字经》主要是顺着孟子一脉来讲的。但是,要么是《三字经》的作者没有能够把握孟子的真实思想;要么就是他根据自己对孟子的理解,有意或无意地将“性(向或趋)善说”推到了绝对化的“性本善”的绝境,那其实已经是谬误了。

正因为《三字经》是最普及的童蒙读物,原本近乎向壁虚造的,在儒家思想里根本不存在的“人之初,性本善”,竟然也就借势喧腾于人口,并由此深入人心。由“向”偷换到“本”,流波所及,关系极大。既然“性本善”了,那么,《三字经》的首要核心概念道德的“教”与“学”也就几乎成了无的放矢,顿时失去了前提和理由,余下的似乎也只能是

技能方面的“教”与“学”了。毫无疑问,这肯定是和《三字经》所要传达的理念抵牾的。

著名的美籍华裔学者张灏教授在其名著《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中,有非常精当的论述,粗略的大意是:西方传统中,只有上帝是无罪的,人则都是有原罪的。换句话说,人性是恶的,或者有着不可忽视的恶的可能。因此,对谁都不能无条件地信任,不能把权力集中起来交付给任何一个人,必须有法制来加以约束。而在中国,由于大家相信或是以为人性本善,那么,就可以用某种特殊的教育方式使得人人皆可尧舜、满街都是圣人。于是,只要确信找到了一个“圣王”,就应该将一切都无条件地交托给他,哪里还有法制的必要呢?

我们不禁会有点担心,接着“人之初,性本善”,《三字经》还怎么能够讲下去呢?幸好,紧接下来的“性相近,习相远”是确凿无疑地出自《论语·阳货》的,被戴上了莫名其妙的帽子的《三字经》正是接着这六个字铺陈开去。我想,其实《三字经》就以此两句开头或许更好。

《三字经》及其所传达的思想理念,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

刘宏毅博士算过一笔很有意思的账。就识字角度论,小学六年毕业的识字标准是2450个汉字。照此算来,平均每天学一个字。《三字经》一千多个字,背熟了,这些字大致学会了,所花的时间应该不用半年。

不过,更重要的还是如顾静先生所言:“《三字经》三字一句的形式及简明扼要的内容——前者语句简洁、抑扬顿挫,故而朗朗上口而易记易诵;后者则以短小的篇幅最大限度地涵盖中国传统社会的各种常识,提挈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通过《三字经》给予蒙童的教育,传统社会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一个人在社会化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内在价值取向与精神认同。”

在过去,包括章太炎在内的有见识的学者,多有致力于《三字经》的注释和续补者。近期,文化部原常务副部长高占祥先生还创作了《新三字经》,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三字经》早就不仅仅属于汉民族了,它有满文、蒙文译本。《三字经》也不再仅仅属于中国,它的英文、法文译本也已经问世。1990年新加坡出版的英文新译本更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儿童道德丛书”,加以世界范围的推广。这一切,难道还不足以说明,《三字经》及其所传达的思想理念,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吗?

改革开放30年来的中国,在经济、社会等领域都取得了令世界为之瞩目的巨大成就。民族的复兴、传统的振兴、和谐的追求,都要求我们加倍努力增强文化软实力的建设。我们的目光紧盯着远方的未来,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心神必须紧系着同样也是远方的过去。未来是过去的延续,过去是未来的财富。

不妨让我们和孩子们一起,怀着现代人的激情,读一读古代人的《三字经》。(钱文忠 来源:解放日报)

说“三味”

说起“三味”,读书人会立刻联想起鲁迅的名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但何故曰“三味”?鲁迅翁在文中并未交待。我在寒斋翻书,翻来翻去,未能找出确切答案。询之文坛前辈某老,答曰,可能是新典,待查后告我。再询之研究鲁迅的某友,说:曾见报刊上有人写过两三篇文章谈此,有本研究鲁迅的书中也提到过,说法不一。有的说指稻、粟、粟,食之“三味”也;有的说指时间,早、中、晚,云云。这个答复使我觉得对“三味”“劳实”,即“摩弄阴蒂”至佳境,毕竟尚未觅得真谛。于是又致电舒芜先生请教。舒老很快寄来一条材料,是李淑(邯郸书目)(《增广诗句题解汇编》引书)中的一段话:“诗书,味之太羹;史为折俎;子为醢醢:是为书三味。”这段话属于“之乎也哉”之类,译成白话文,就是——“诗书是肉汤汁;史书是切肉;子书是醋、肉酱:这就是书的三味。”舒芜先生注明,《增广诗句题解汇编》见于《人民日报》1981年10月7日载珏人的《书的“三味”》一文。此书,此文,我均未读过。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有点让人败兴的考据雅兴的,譬如曾斗胆“太岁头上动土”,作过《“万岁”考》,最近还

“直心”不死,想作《太上皇考》《历代皇帝临终遗言真伪考》之类。但是,对于“三味”,我却不想考据文章:一是时下炒红学冷饭者大行其道,门庭若市,研究鲁迅不逮远矣,再去抢他们的饭碗,非所计也;二是中国的古文献太多,倘有时间,慢慢在书海中寻觅,常常能找出惊人的然而是大煞风景的材料。例如,从马王堆出土的古籍可知,《红楼梦》中常常挂在先生、女士嘴边的口头禅“劳什子”,在2000多年前,原称“劳实”,即“摩弄阴蒂”之意。呜呼!这大概真要让曹雪芹老先生培养出来的为数颇可观的专家、学者大感意外了。谁又能知道,若对“三味”详加考据,会“烤”出什么特别味道来呢?不学如我,还不如就此却步,拉倒。

其实,有考据癖的人,毕竟是包括笔者在内的少数在线装书堆里向古人要稿费的“书虫”——美其名曰学者。对于一般读者来说,知道历史上曾经有个“三味书屋”,“三味”可能有种种典故,而更重要的是,知道有位从“三味书屋”中走出来,走向更广阔的人生,饱尝人间的酸甜苦辣,最终成为伟大的文学家的鲁迅,也就够了。(王春瑜 来源:天津老年时报)

国无辞书,无文化可言

《辞源》原本是一部与《辞海》定位完全相同的综合性百科辞书,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辞源》后被修订为一部专门收集古汉语词汇的专用辞书,所收字词一般不晚于1840年。从1908年起,几代学人在《辞源》上的皓首穷经、含辛茹苦,换来的是中国传统典籍的文化传承。

陆尔奎提议编纂“辞源”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这一年的中国很不幸:光绪皇帝年纪轻轻没了,不到20个小时,慈禧太后也没了。光绪皇帝是很想政治改革,实行立宪的,但是他的抱负没有实现。随后,小小的溥仪被抱到了皇帝宝座上。此时,全国各地同盟会发动的起义风起云涌……

1908年,《辞源》开始编纂了!提出并负责编纂《辞源》的人,叫陆尔奎。

陆尔奎生于1862年,是晚清举人,曾在天津北洋学堂、上海南洋公学、广州府中学堂任教。1906年,陆尔奎被介绍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1897年创立,是我国现代出版业的始祖。

此时中国正站在历史的十字关头,西方文化迅速冲击着中国传统,本土文化经受着前所未有的考验。新式教育与传统教育,没有找到合适的接轨途径,旧有学人对新思想新文化不了解,而年轻人对自己本土的经典开始陌生起来。陆尔奎觉得:“国无辞书,无文化之可言也。”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陆尔奎一进商务印书馆,就向经理张元济提出,要适应时代变化的要求,中国人只有一本《康熙字典》是不行的。张元济拍板成立了商务印书馆字典部,陆尔奎任部长。两年后,陆尔奎于“戊申之春”,“决意编纂”《辞源》。

首次提出“辞书”概念

《辞源》第一次提出了“辞书”的概念。陆尔奎指出:“凡读书而有疑问,其所指

者,字也。其所问者,皆辞也。……故有字书不可无辞书,有单辞不可无复辞。”“语词为主,兼及百科”,《辞源》成了“百科词典”。

1915年,《辞源》正编面世。全书收有单字一万多个,词目近十万条。陆尔奎因为编辑《辞源》双目失明,1935年去世。

传统文化不死的明证

1952年,新闻出版署把公私合营后的商务印书馆从上海迁到北京。1954年,在“老商务”的基础上成立了高等教育出版社。不过,商务印书馆的牌子还在。

1958年,商务印书馆又从高等教育出版社独立出去,这一年正是《辞源》编撰50周年,其修订工作亦悄然启动。《辞源》修订本有三位主编,他们是:吴泽炎、黄秋耘和刘叶秋。为修订《辞源》,吴泽炎做了六十多万张卡片,耗时二十余年,字数多达千万。

1980年,《辞源》修订完毕。在风雨飘摇的100年里,我们从张元济、茅盾、叶圣陶等人的诗句,写成商务印书馆歌《千丈之松》中,似乎可以读到中国传统文化不死的明证:

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求;是良田好耘植,有秋收获仗群才。世事白云苍狗,风涛激荡,顺潮流左右应付,稳度过滩险浪急。论传天演,木铎启路。日新无已,望如朝曙。

敢云有志竟成,总算楼台平地。从今以后更艰难,努力还需再试。森森兮千丈之松,矫矫兮云中龙。言满天下兮百龄之躬!

《辞源》是一笔无价的精神财富、人文财富,因为它是中国文化传承的100年前我们的老学者编撰了《辞源》,50年前又有老学者修订了《辞源》,今天我们再想编辑这样一本专研古典文献的工具书已经不可能了。正是因为有了《辞源》,我们进入古代典籍中去,少走了许多弯路。(刘红庆 来源:北方周末报)